

学生课外读物

0153254

郭仁怀  
编著

黄山  
书社

血与火

凝成的  
诗歌

赏析



## 血祭中华 （代序）

### ——谈抗战诗歌中死的主题

人们常把爱情和死亡说成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若就人类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长河来说，二者诚然是常写常新的表现对象；若就某个历史阶段来说，却又不尽然，二者往往是互相排斥的，各有兴衰。早在新文学革命的初期，就有“为人生”、“为艺术”之争。有人主张“血和泪”的文学，反对脱离苦难人生的“纯艺术的艺术”；有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只应抒写性灵与表现美。后者所追求的“纯粹的艺术”，除了留意于艺术形式上的锻造之外，在内容上大多是描写远离社会生活的空幻之爱与爱情至上，以及抒发自我心灵的隐曲迷惘。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又出现革命与恋爱的矛盾，爱情始被置于从属地位。到了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血战主题一直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爱情主题和所谓纯艺术美几乎被淹没在火光血色之中。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安定，经济腾飞，科学文化也迅猛发展起来，人们的艺术趣味趋向多样化，再加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少人偏爱轻快的节奏、柔曼的情思、甜美的忧愁，有暇去细细刻绘爱情的花絮、心灵的曲线。于是，有的人开始厌烦粗犷的呐喊和死的主题，并进而否定过去，以“断裂”二字来概括战争年代的文学史。这种“今人嗤点流传赋”的排斥情绪和

轻率做法，显然是违背历史常识的，也是有害的。

—

我们知道，自从“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中华民族曾全面陷入灭顶之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到处充满了血腥气、烟火味。当时中国人民绝大部分生活在颠沛流离、兵荒马乱的境遇中，自然没有兴致去寻幽觅趣、消闲自得（少数达官贵人和奸商除外），连正常的谈情说爱机会也极少，只能把爱深深压在心底。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各种流派都毫无例外地承担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任务，从不同角度直呼着、反映着、表现着、透射着、象征着血与火的时代壮剧、死的主题。

“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在发刊词中呼吁道：“在震天动地的抗战炮火声中，必须有着和万万千千的武装健儿一齐举起了大步的文艺的队伍；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敌而去！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流，以血肉为长城，拚头颅作炸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堡垒。”这种以笔当枪，当“进军的号声”，当战斗的“堡垒”等文艺主张，是顺应着民族的需要，时代的召唤而提出来的，要求把所有的文学艺术都纳入抗战的轨道，表达抗战的大主题。其实鲁迅先生在全面抗战的前一年就提出过相类似的主张，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共有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有关；例如吃饭

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里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作为文学中最敏感、最精粹、最便捷的样式之一诗歌，理所当然要成为抗敌的炸弹和进军的号角。

在八年抗战中，诗歌也的确最早以战斗的姿态登场，并且先后掀起过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传单诗运动等群众性诗歌热潮，形成一个诗的时代、战歌的时代。正如郭沫若1942年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一般说来，反侵略性的战争便和人类的创造精神，或文学艺术的活动合拍”；“先就文学来说吧，诗歌最受着鼓舞，因为战争本身的刺激性，又因为抒情诗人的特别敏感，随着抗战号角，诗歌便勃兴起来，甚至诗歌本身差不多就等于抗战的号角。抗战以来，诗人之多，诗歌产量之丰富，是超出其它各部门的。人们对于诗也表示着特别的欢迎。”(2)

抗战时期由于物质条件限制，所产生的大量诗歌很少能够正式出版发行或在刊物上发表，绝大部分只能公布于会场、街头、墙头、岩壁、路边、战壕、传单等场合。许多诗歌虽不能久存广传，却能在诗人周围迅速产生巨大反响，鼓起人们爱与恨；有的还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诱发和派生出新的战斗诗歌。这就要求诗人必须有感而发，讲真话，抒真情，来不得半点矫情虚语。诗人还必须敢于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实生活，喊出大家共有的抗日救亡、报仇雪恨的心声。一句话，诗歌必须从生活实感出发，从大时代出发，充分抒写抗战的大主题。这当中有赞歌，也有悲歌。无庸讳言，抗战诗歌中悲歌多于赞歌，死的主题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目的都是为了歌唱抗战，鼓动抗战。

## 二

抗战诗歌中死的主题，不仅是抗战大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最集中、最强烈的体现。因此，这种死的主题，仍不是个别的具体的主题，而带有母题性质。归纳起来，大体又可以列出以下六个方面。

(1)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借以激发人们的民族义愤，从而更加顽强地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在斗争中报仇雪恨，保家卫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的种种暴行骇人听闻，所犯下的罪责罄竹难书。这一切，在抗战诗歌中大多有所记录和反映，将永远是历史的铁证。例如邵子南“为纪念望都五十九个殉难烈士”的纪实诗篇《五十九个》，就是抒述1940年4月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一次惨案。一天夜里，敌人突然包围了柳陀村，捉去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又是烙铁烙，/又是用钢针刺心，/没有一个人肯招，/没有一个人肯变心”，结果这批人全被敌人杀死，一共五十九个。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凶残狠毒，同时也可以看到边区老百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教育下，觉醒了民族意识和硬骨头精神。

夏川的《沙区劫后——控诉日寇“四·一二”扫荡和暴行》，也是以写实的笔调，深刻反映了日寇在中国城乡特别是边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是人间？/还是鬼城？/而今，我涉足在无人的沙区。”再向西行三十里，“村村都有灾情”，男女老少几十、几百被杀害，惨象目不忍睹。还有辛劳的《捧血者》，方冰的《柴堡》，白刃的《恰恰和李埝》，何其芳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等长诗，对敌人的狰狞面目及其罪恶行径，

也有较为深刻、较为详备的描写与揭示。当然，中国人民是杀不尽的，凌辱和屠杀不但不能使他们屈服，相反会激起他们更加有力的反抗。诗人记录并展示那一幕幕血淋淋的真实惨景，其目的主要就在这里。

(2)悼念烈士，追忆和赞美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为国捐躯的奉献精神。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八年抗战，我们有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身分不同，但都死得光荣，死得有价值，都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都是诗人歌咏的重要对象。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同志，在1942年夏季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壮烈殉国。叶剑英同志闻讯后，痛失战友，写下词《满江红·悼左权同志》：“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试看那枪满地，汉家旗帜。剩水残山容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问伊谁，百万好男儿，投有北。// 崦嵫日，垂垂没，先击败，希特勒。会雄师，踏上长白山雪。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月落疑颜色。最伤心，河畔依清漳，埋忠骨。”这首词从抗战全局出发，高度评价左权将军及“百万好男儿”为了捍卫自由中国，坚持敌后斗争，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屡“标奇迹”的历史功勋；对中国抗战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这也是战友之间平常所期许的。但在眼下“风起云飞”的战乱年月，不能不深深怀念英勇善战的战友，更为河畔“埋忠骨”而伤心。全词气魄恢宏，豪迈中见挚情。

燕遇明的《悼年轻的鲁明》，也是悼念战友之作。鲁明是一位“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战士”，机智而勇敢。在一次攻打敌人堡垒的战斗中，他冲锋在前，不幸中弹身亡。诗人深为失去“年轻的好友”而哀痛，但也为他“勇猛地生活，勇猛地死去”而自豪。诗中写道：在他的身后“无数英勇的青年们，/到处踏着烈

士的血迹战斗着！/从日寇和卖国贼的手中，/夺回新中国的土地！”足见其死得伟大而光荣，诗人不禁满怀激情地发出召唤：“举起刀枪勇猛的战斗吧！”

我们有无数的英烈，也有不胜枚举的悼念性诗歌。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贺敬之《志丹陵》、郭小川《一个声音》、丹辉《哀歌七章》、吕剑《纪念碑》、力航《雪野，洒下点点鲜血》、陈学昭《纪念的日子》、闻捷《哀歌》、柯仲平《悼星海》、彭燕郊《葬礼》、鲁藜《夜葬》、邓拓《祭军城》、萧军《小招》等等。这里有新诗歌，也有旧诗词，其主旨都是为了纪念死者，排解内心悲愤之情；激励生者，推动更多的人走向战场，勇猛杀敌，夺取抗战的胜利。

(3) 抒发爱国志士的战斗豪情，表现他们英雄赴义的大无畏精神。在抗战诗歌中，有一批杰作是爱国志士面对死亡吟啸出来的，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句句见真情，用今天的时髦说法，就是主体意识很强。陈辉的抒情长诗《为祖国而歌》，即是表现他诚挚的爱国之情和崇高的献身精神。诗的最后写道：“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笑，/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我高歌，/祖国呵，/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这是何等高贵的精神境界！是诗，也是誓辞。当时诗人正战斗在华北敌后的游击区，环境极其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酷烈的灾难都有可能降临。然而他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的最高信念就是保卫祖国，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血肉，甚至以为国牺牲而感到光荣，所以他能面对屠刀放声“高笑”。后来，诗人果遭不测，死得比他诗中所写的更其壮烈。“1944年的春

天，他和一位游击队员，到达韩村，敌伪二十多人将陈辉包围在一间房里。陈辉机警的举枪还击，打死一个敌人，打伤了几个敌人，在冲出门外的時候，被预伏的两个特务，环腰抱住。这时候，他拉断在身边的手榴弹弦，手榴弹轰然一声，吓退了敌人，但也就在这一次战斗中，他英勇牺牲。”(3)像这样为国捐躯的诗人还有蒲风、高咏、蒋弼、雷焯、仓夷、司马军城、史轮、任霄、丁基、严杰人、辛劳、赵石宾、裴世昌、邹笑朗、钱毅、戈里(沈文林)、劳姦等。他们大多有抒豪情明壮志之作。

更多的还是诗人笔下的爱国壮士形象，以及对他们血战历程的抒述与歌赞。在这方面，叙事长诗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何其芳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主要描述泥水匠王补贵的成长过程。他后来当上八路军通信班长，在执行任务时受伤被俘。面对酷刑，他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被日本兵活活烧死，表现出一个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袁勃《不死的枪》，真实地记载并热情讴歌了新四军战士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事迹。我们几十个战士为“保卫一个村庄”，与敌激战终日，全部壮烈牺牲，“但众多的敌人/并没敢向村庄前进……”。从此，人们歌唱“不死的战士，不死的枪！”夏川《血战苏村》，抒述了另一场更其惊心动魄的血战经过。1941年1月15日，敌伪纠集2万余人，对鲁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我方特务营在完成掩护领导机关突围转移之后，被敌包围。尽管众寡悬殊，战士们仍据守苏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全营除少数几个侥幸生还外，126名指战员阵亡。在这场血战中，敌人也受到重创，“怅然退去”。诗人在开头“献诗”中写道：“我把庄严的颂歌/和真挚的爱，/全部献给你。/你，中华儿女的英勇旗手！/……你是胜利的象征，/



光荣属于你！”这里无异于为英勇旗手们立了诗碑。

此外，还有艾青《吹号者》、魏巍《黎明风景》、田间《铁的子弟兵》、方冰《柴堡》等。虽然有的诗并不全写死的主题，但在某些章节里重点描写了爱国壮士的战绩及其英勇赴义的高大形象，也被列入此类。

(4)反映普通民众的复仇意识和流血斗争。面对侵略者的屠杀和暴虐行径，中国普通民众也不甘作任人宰割的奴隶。他们有的因被敌人激怒而自发起来反抗的，有的初步觉醒而自觉加入到抗日斗争行列。总之，都满带着复仇情绪，不惜以头掷向敌人。无数可歌可泣的惊人之举，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那些深入前线，深入群众的诗人们，不能不为之激动，并及时酿造成诗句。田间的墙头小诗《坚壁》：“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诗人摄取刑场上一个镜头，一段人物语言，表现出敌后边区普通民众的仇敌情绪和无所畏惧精神。这里没有直接描写血与火，却使我们感到人物四周充满刀光剑影，可以想见随即出现的各种惨烈场面。

管桦的《送葬》，“记一个倔强的老人”。老人叫郭振东，敌人用重刑“逼他在人群里认出/哪个是八路军”。倔强的老人就是不说，并挣扎着要与敌人拚命。老人被敌人枪杀了，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有一颗正义之心，爱国之心，在生死关头经受住了考验，不愧为“一个宁折不屈的英雄/一条铁打汉子！”他的死同样是英勇的、伟大的、令人敬仰，催人奋起。同类的还有那沙《老人》、冯毅之《马鞍山组诗》、公木《崂山谣》、刘艺亭《浚阳河的女儿》、林采《遵守国民公约》等。

(5)歌颂为中国抗战献身尽职的国际友人。中国的抗日战

争不仅仅是为了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战场，因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不少国际友人在这场战争中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著名的有病逝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牺牲在新四军抗敌前线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死难在东北的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等。他们理应受到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爱戴和纪念。

白求恩大夫为了抢救八路军伤员，误割了自己的手指，中毒而死。洪流在《哀悼》中沉痛地写道：“是冬天了，/溥沱河冰冻了。/中国弟兄悲凉地传说着：/‘白大夫死了！’//呵，白求恩同志，/我们想念你！/……你和无数个八路军弟兄们/一起长眠在受着苦难的北中国大地上了。”诗人抒述并歌颂了白求恩大夫的光辉战斗历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认真严格的工作态度，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同时也为他的死表示万分痛惜和哀悼。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发出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段文字也充满了诗意与诗情。自此，白求恩精神及其光辉形象教育了我国几代人，至今仍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6)鼓吹抗战，宣扬殉国精神。爱国诗人们为了鼓吹抗战，召唤战斗者，加强人们的杀敌决心和勇气，常常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提高到神圣的境界，为之流血牺牲便成了人生的最高追求，也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表现。艾青在《时代》中，即是宣扬要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去迎接民族解放时代的到

来：“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只有对祖国对新时代爱得如些至深至情，才会有为之交付出一切的愿望与痴举。

丁玲在长诗《七月的延安》中，则是直接召唤人们：“……拼将 头颅堕地/碎骨粉身/要 挽救危亡/夺回土地/争取民族的荣光/健儿们/勇敢向前 抗战/芦沟桥 炮火又响/把这群强盗杀光。”田间在《给战斗者》中，也是急切地召唤人们为保卫祖国，保卫悠久的民族文化，保卫和平安宁的生活，起来同凶恶的敌人作拚死的斗争：“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并告诫人们，“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也就是鼓动人们宁可战死，也不能苟活当奴隶；而战死决不是可怕的悲惨的结局，相反倒是一种光荣的归宿，是值得赞美的英雄壮举。这类以殉国精神为主题的抗战鼓动诗，在抗战前期相当盛行，一度蔚为大观，几成诗歌发展主潮。

### 三

古人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抗战诗歌中有关死的主题，大凡都是写其重于泰山的一面。不论是悲惨的还是壮烈的，皆能催人觉醒，鼓人斗志，推动抗战走向胜利。对此，已有专家作过评说：“生活在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诗歌作者，他们经受着血与火的锤炼，能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这种‘枪笔并举’的特殊环境孕育出一种雄健乐观的诗风。这种新诗歌具有时代的先锋意识，明确把歌颂抗战救国作为一切的主题，它无愧于那个时代对诗歌文学的嘱托与期望”（4）。此说

以抗战大主题为立足点，切中肯綮，颇具史家胆识。这里应作补充的是：抗战诗歌有主干，也有分枝，除了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边区）的大量诗歌之外，在国统区、上海“孤岛”以及敌占区，也同样有“经受着血与火的锤炼”的诗歌作者，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具有时代的先锋意识”，同样不回避死的主题。

上面所列举的诗句大多出自解放区，下面不妨再看看远在敌占区腹地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烈士的《远征颂》：“万里长征，山路重重。/热血奔腾，哪怕山路崎岖峥嵘。/纵饥寒交迫，虽雨雪狂风，/我同志慷慨直前，不怕牺牲。/奋斗！冲锋/为革命，流尽血，/事业成，变为光明。”东北抗日联军当年所处的险恶环境及其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世人皆知的。这首诗也一再提到山路崎岖，饥寒交迫，流血牺牲，但诗的格调并不消极悲观，诗句中洋溢着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受到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带有净化心灵的壮美。

王凌波、姜国仁夫妇在国民党长沙监狱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而作的《狱中联句》：“东北沦亡已十年（波），如今狼虎闯垓埏（仁）。血流漂杵沙场劫（仁），鬼哭烧垣并里烟（波）。四亿民心金可镂（波），千秋史迹党争妍（仁）。莫伤一己生和死（仁），且喜红潮浪激天（波）。”当时国民党当局正掀起反共高潮，王凌波同志担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夫妇俩一同被捕入狱。在生死莫保的情况下，他们忧心的不是身家性命，而是国家民族的安危；同时又不因敌顽凶恶、沙场血流漂杵而灰心丧气，对四亿民心所向和革命的光辉未来充满必胜信念。因此，他们能从死里看到生命之光，身处逆境犹达观无伤，其高风亮节与乐观主义精神简直

前无古人。

远在大后方的新疆维吾尔族诗人鲁特夫拉·木塔里甫的《我决不……》，也表达了一个爱国战士的硬骨头精神。诗中的“我”承受着黑暗势力的巨大压力和死的考验，然而压力越大，死得越惨，越是激起“我”的顽强反抗与歌唱，越是坚信人民的伟大力量及光明前途。

由上可见，抗战诗歌中大量写到血与火，或以死为主题，无非是要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和决心，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思想精神诗化。所以，这类诗歌既有直接的宣传鼓动作用，又具有美感效应。其美感效应通常是由悲剧性上升到壮美与崇高，人们不只是为之洒下同情的眼泪，在心灵上求得某种发泄和平衡，更重要的是实现情感意识的净化和升华，向着造福民族、造福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思想至境趋进。

有人把“人”的觉醒，主体意识的确立，说成是“为我”，而把为集体、为民族、为人类作出牺牲，说成是“我”的丧失，是傻子。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时代的雷锋精神可以不要，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也是多余的，推而广之，一切正义的战争都是多余的，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自己的利益，主体的需要就行了。这种唯“我”哲学，明显同社会需求，人生要义相悖，当年就曾被汉奸和叛徒利用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先驱者，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宁和发展，更何况是在民族危难大敌当前的时候。鲁迅先生说过：“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sup>(5)</sup>我们无数先烈正是这样做的，抗战诗

歌也是这样写的，今天以至将来一定还会有以生命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人。

那么抗战诗歌中死的主题及其透射出来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否还有教益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以及世界性的战争祸根并没有排除；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还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长期奋争的中心内容。我们要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即是当年先烈们遗志的实现和延伸。因而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不可无，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可丢，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不可少。如果说今天仍有必要进一步确立主体意识，仍需要张扬个性，那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五四”时期在反封建旗帜下寻找自我，更不是采用尼采哲学以“排众数”来无限扩张自我，而是要在兴邦立国实现“四化”的大前提下，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确立个人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达到发家致富或成名成家的目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寻找应有的位置。但这一切都应当同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决不能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鉴于此，重新读一读抗战诗歌，重新温习一下先烈们的悲歌壮词，肯定是大有意义的。

#### 四

对于抗战诗歌，历来都有很多人认为艺术粗劣，不耐咀嚼，甚至贬之为政治号筒。相对来说，其总体艺术水准的确不算高，但也不应一概而论，至少以死为主题的这部分诗歌就不

乏传世之作。谁都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样式。衡量一种文学，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和态度，那就是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具体分析，并以整个历史长河为参照系。过去常出现以一个时期的社会需要和美学标准去衡量另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那样难免会产生否定过多的偏颇。例如解放初期，我们曾一度以战争文艺的标准去衡量我国平时期的新生文艺以及现代派外来文艺，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货色、颓废艺术、靡靡之音等，结果妨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同样的，在当前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大家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趋于多样化、精细化，同时还追求消遣性和娱乐性。诗人和艺术家们可以各显神通，或去谱写多彩的时代乐章，或去雕琢细巧的袖珍雅品，或去抒写性灵、神韵以及曲变奇异的朦胧美……。许多新的美学原则是应该及时去总结的，只是不要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轻快跳达的电子琴去否定当年的黄钟大吕，以新翻的“杨柳枝”去哂笑当年的“从军行”、“大风歌”。

以死为主题的抗战诗歌，其总的艺术特色是：真挚、朴实、粗犷、明朗，趋向于民族化、大众化。这也是整个抗战诗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前人对此早有较为详备而又深刻的论述，这里摘要加以评介，以期温故而知新。

老舍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中，代表“文协”发出倡议：“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少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

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枪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这就充分肯定与倡导了文学的战斗作用，同时也肯定与倡导了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倾向。老舍所倡议的其实关系到抗战文艺运动的总体任务和方向，抗战诗歌无疑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和要求向前发展的。

胡风在《四年读诗小记》中，谈到为什么要出版《七月诗丛》时说：“如果诗底生命是人生战斗底凝晶，那么，这些生活深处发出的初来者底歌声，它们底诚实，它们底质朴，它们底粗犷，也许正值得被诗人们一顾；这也是我终于选集了这一本的又一个原因。”胡风作为一个著名诗人、诗论家、编辑出版家，他之所以赞赏部分抗战青年的诗作，就因为它是“各自从生活底深处唱出了真诚的声音”，它“诚实”、“质朴”、“粗犷”，还因为它“说明了诗人底生命要随着时代底生活前进，时代精神底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足见这种真诚、质朴、粗犷的诗歌特色，已不是个别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体式诗人的总体艺术倾向，是时代精神、战斗生活、群众需要使然。这一点，我们从上面引用的部分诗例大约也不难看出。

闻一多在《时代的鼓手》中，高度评价了以田间为代表的粗犷派抗战诗歌，认为“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



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并说“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很显然，闻一多是从大时代的需要出发，赞赏抗战诗歌中那些充满着“仇恨的力，仇恨的血”的诗句，那“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召唤着“时代的鼓手”。他无意于否定“绝妙的琴师”，认为那是“第二步的需要”。至于抗战胜利，新中国建立，一度缺少“绝妙的琴师”和“迷魂音乐”，当然不能怪罪于闻一多。其实，以死为主题的抗战诗歌，并非都是单调的鼓点或激越的战叫，也有琴音和笛韵，还有协奏曲、交响乐之类的巨作。就是田间本人也写有被人们称为“较成功的诗”，其他像艾青、臧克家、蒲风、萧三、燕遇明、高兰、魏巍、李季等，以及“七月”诗派的众多诗人，都写下大量真挚、朴质、明朗而又艺术精湛的诗歌。其中许多诗篇不仅无愧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也将永远熠熠生辉。

周扬在《谈文艺问题》中说：“新的内容要求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技术就是赋予内容以一定形式，求得内容与形式和谐的一套方法，一套手段。内容决定形式，思想指导技术，这是确定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形式对于内容也发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轻视形式，轻视技术……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利用旧形式’了，而是对民间形式表示真正的尊重，认真的学习，并且开始对它加以科学的改造，从这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出来。文艺上的民族新形式正在生长与发展的伟大过程中。”他是针对抗战后期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文艺发展状况而言的，辩证地阐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创造新的民族形式”